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

刘少奇

胡长水 / 著

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

刘少奇之路 2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有说不尽的毛泽东，同样有说不尽的刘少奇

洗掉抹在历史上的油彩
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
真实就在你们面前
答案由你自己寻找

这是破解这位伟人命运的惟一密码

最真实的解密档案
最权威的历史资料

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

刘少奇之路

第二卷

临危受命

胡长水 / 著

责任编辑:春秋

封面设计:董炜

责任校对:冯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胡长水等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1.12

ISBN 7-80136-671-9

I.刘… II.胡… III.刘少奇(1898~1969)—传记 IV.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0618 号

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

胡长水等 著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9723 信箱 邮编:100029

地址:北京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 10 号院(北门 10 号楼)

电话:(010)64946059 传真:(010)6496801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省霸州市福利胶印厂

900×1280 毫米 A5 印张 43 1,200 千字

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4000

ISBN 7-80136-671-9/K·578

定 价:69.80 元

临危受命



命 受 危 临





先机定华北

最初的抵抗

295

- 卢沟桥事变爆发。
- 时局虽然艰难复杂,刘少奇却是异常地坚毅、果敢,迅速地调整党的行动路线。
- 威震华北的“胡服”是谁?

1937年7月7日深夜,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

卢沟桥的枪声,把日本政府的全面侵华野心进一步暴露出来。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由东北而华北,向中国腹地步步进逼。卢沟桥是北平的西南要冲。日本侵略军侵占卢沟桥,显然是要实现对北平的完全包围,进而夺取平津,进占华北。果然,形势迅速恶化。7月11日,日本政府即发出《派兵华北的声明》。同日,日本参谋本部发出命令,从朝鲜和中国东北抽调第二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第十一旅团赶赴华北,以加强其中国驻屯军。7月29、30日,北平、天津陷落。华北和中国西北部最重要的屏障失去了。

严酷的现实,又一次把民族危亡的危险,推到了中华民族各

个阶级的面前,尤其是国共两党面前。



中共北方局机关旧址——太原成成中学。

中国共产党率先做出反应。7月8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随之,为推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实现,中国共产党频频与国民党进行接触、谈判。

面对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和难以为继的自身统治,国民党政府也在进行着抵抗的准备。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是,此时的蒋介石,仍然没有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因此使得国共谈判步履艰难,直到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才发表中共于7月15日提交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又实行一条不





发动与武装人民群众,单纯政府与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

这些,就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内的基本政治局势。这是一个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但又交织着阶级矛盾的复杂的政治局势。

时代呼唤着能顺应历史潮流、驾驭战争全局的先进政党,也呼唤着能在这个战争舞台上纵横驰骋的卓越领导人!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刘少奇因为参加白区工作会议,尚在延安。

7月8日,也就在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的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地处抗日前线的北方局发出指示。指示就华北的工作方针提出四条要求:(一)进行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华北的宣传与组织动员;(二)迅速组成坚固的统一战线,对付当前的重大事变;(三)立即在平绥平津以东地区,开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在平汉线、津浦线亦应准备组织义勇军,注意与各界爱国分子合作;(四)进行坚决的反汉奸斗争。

中央的方针十分明确。然而,面对着如此严重甚至是有些混乱的局势,如何去具体地组织实施中央的方针,北方局的具体行动路线是什么?仍然需要进行审慎而迅速的抉择。

刘少奇已深深感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作为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最要紧的是要正确地、及时地决定行动的方向。

他在敏锐地捕捉时局发展的每一个信息,迅速地确定斗争的行动路线。

时局虽然艰难、复杂,刘少奇却是满怀着民族的悲愤,异常地坚毅、果敢。

根据中央的战略意图,刘少奇没有回北方局原来的所在地北平,而是直接奔赴山西抗日前线。

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中共中央早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时就已确立了这一构想。1935年冬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步步进逼,红军如何立足陕

北向外发展,中共领导层存在四种不同意见,即向东(山西)、向南(陕南)、向西(宁夏、甘肃)、向北(绥远、内蒙古、察哈尔)。毛泽东力主向东,打通直接抗日的路线。在同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做军事战略问题报告,阐述了东征山西的意义和条件,统一了党内的认识。会后,毛泽东进一步筹划东征山西的军事行动。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亲率由红军第一方面军组成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意在开辟以吕梁山为中心的根据地。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正义之举,却遭到蒋介石、阎锡山重兵阻拦。为避免大规模内战,一致抗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6年5月5日发表了《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尔后迅速回师河南。全面抗战的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逐渐形成,为中国共产党进入山西抗日前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7月16日,刘少奇从延安出发,首先到达陕西泾阳县云阳镇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受中央委托,传达任务。随后,经西安奔赴山西。

7月28日,到达太原。在党内,他化名胡服。

此时的太原,已处在一片紧张的空气之中。北平危在旦夕,山西已是大军压境。土皇帝阎锡山虽有心抗战,但却受到蒋介石多方掣肘,正茫然不知所措。

刘少奇一到太原,便立即展开工作。当晚,即电告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转北方局留守人员林枫:我已抵太原,正设法与各方党部联络,并指导工作。他提出了行动上的两种选择:在宋哲元退走后,应竭尽一切力量动员群众,联合各种武装部队,为最后的保卫平津而奋斗,坚决打击日寇、汉奸。二是如因形势不利,保卫平津已无可能,在平津不能存在的群众领导与党员方可有计划的离开平津,到军队与农村里组织抗战。来太原的秘密机关及秘密支部尽可能保持。民先队总队部、华北救国会等,如在北平不能存在,可移至太原。

局势很快恶化。第二天,北平陷落。第三天,天津陷落。

以林枫为首的北方党留守干部已在北平无法立足,赶紧撤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刘少奇立即于8月初在太原组建中





共北方局新的领导机构,成员有刘少奇、杨尚昆、朱瑞、彭真四人。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任副书记,彭真任组织部部长,朱瑞任军委书记。新的北方局机关设在太原成成中学东侧的一个四合院里。

新的北方局迅即担负起领导北方党和广大群众抗日斗争的重任。

首先是如何有效地组织起广大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8月3日,刘少奇向张闻天报告在平津失陷后北方局给华北地区党组织的指示要点:“我们在平津附近及日军后方,应普遍发动游击战,在平津应加紧准备,响应抗日军的武装斗争,以致武装暴动,收复平津。在我军后方,加紧统一战线的活动,组织与动员群众参战,为各地党部主要任务。准备游击战争,组织志愿兵、自卫军等。在战区,准备建立战地委员会等抗日政权。”

这里,刘少奇和北方局已经把准备游击战争提到了重要地位,但其目标仍是“收复平津”,仍没有放弃在平津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

然而,由于国民党的几百万正规军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时局在继续恶化。8月1日,日军14架飞机开始轰炸平绥铁路;8月5日,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张家口;13日,日军大肆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

显然,收复平津已不可能了。

刘少奇密切注视战局的发展,迅速调整党的行动路线。

党的工作重心开始放到乡村游击战争上。

北方局在平津失陷后很快决定:凡不能在平津立足的党员和抗日分子都撤出平津,党的领导机关撤退到太原,并且应该迅速坚决地撤退;退出平津的人,大部分应到太原分配工作;不能到太原者,即退到冀东或平津城外的乡村,设法拿起枪来打游击。

但是,党内也有个别负责同志反对撤退。他们利用撤退时某些人的慌乱现象,在党内提出了“反对逃跑”的口号。他们命令党员及群众团体的某些人继续留在平津,仍然企图依靠武装暴动来支持抗日战争。刘少奇坚决地批评这些同志的错误意见和行动,认为:此时党的责任,不是什么“反对逃跑”,而是如何组

组织撤退。如果在此时党不去组织撤退,那只能是帮助敌人。

8月21日,刘少奇致电张闻天:请电王世英(按:时为中共华北联络局负责人)、林枫及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天津市委的负责人设法退出平津到太原来。上述人员退出后,由河北省委负责指导平津、冀东的工作,并在平津建立秘密交通及联络站。刘少奇强调:工作重心应集中在乡村组织游击战争。

这样,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刘少奇就敏锐地把游击战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提了出来。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之所以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及时地发展广大的和坚持的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由此可以懂得,我们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重要和必要的了。”一年后,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论述这个问题时如是说。

英明的指挥员在于能准确地预见战争的走向,及时地提出战争的指导方针。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明确地把游击战争作为战略方针提到党与红军面前的是毛泽东。还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的8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闻天联名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人的电报中,就提出,红军的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必须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其后,毛泽东又不断鲜明地提出这一问题。在这一重大的战略指导上,毛泽东可谓慧眼独具、棋高一着,刘少奇则和毛泽东的认识完全一致,也可谓深谋远虑、难能可贵。说难能可贵,不仅因为这一战略转变于整个抗日战争意义重大,而且就人的认识的转变来说,也非易事,因为“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





的转变”，即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

转变才刚刚开始。

合着毛泽东的步伐

- 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善于驾驭政治和战争风云的领导人，可谓群星灿烂，首推毛泽东，刘少奇则是其中一颗耀眼的巨星。
- 在战略方针这个重大问题上，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思路完全吻合。

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爆发，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面对着日本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心脏地区的威胁，蒋介石不得不进行全国性的抵抗了。8月22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发布命令，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同意八路军到前方作战。

八路军出兵在即，怎样正确地认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红军的作战方针是什么？这一些，都需要在党内进一步统一认识。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会议要讨论军事问题，吸收了前方主要将领参加。洛川位于延安同红军前方将领所在地的云阳之间。

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做了多次发言。他指出，现在已经开始政府的抗战，而且得到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我们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的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他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动游击战争。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



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地发动群众,集中地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洛川会议是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对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抗战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方针给予了高度评价,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对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会上则有些不同意见,但由于红军急于出发,来不及展开讨论。出席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说:“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

会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战前线。为落实八路军进入山西作战事宜,9月初,毛泽东派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到太原同阎锡山当面谈。

对于党和八路军在抗战中的战略方针,毛泽东继续抓住不放。他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由于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认识不足而蛮干。

9月12日,他致电彭德怀,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指出:此原则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9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作用,而有自己的一种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忆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我完全同意你18日电中‘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的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与深刻



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刘少奇、杨尚昆、朱瑞:“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惟一的就是游击战争。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毛泽东还要求:“请以整个华北的部署见告。”

对于战略方针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毛泽东是坚定不移,他又是多么希望全党能够迅速地统一步伐!



1937年12月,刘少奇从山西临汾返回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图为政治局会议人员合影。前排右起:刘少奇、陈云、王明、凯丰、项英。后排右起: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康生。

刘少奇此时的思想和步伐,和毛泽东的思路完全吻合。

9月上旬,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一到太原,刘少奇便多次与他交换意见,其中明确:北方局的工作“以争取山西为华北抗战根据地为中心,加紧布置绥、冀、察的游击战争。对直南(按:指河北大名府以南南乐、清丰、濮阳、长垣、东明等县所属地区)、鲁南及山西应以武装民众进行战争动员为工作中心,而尤以汾河

流域及直南、太行山脉为最急,以吕梁山脉为后路。”根据这一思想,北方局在太原召集山东、绥远等省委书记研究了发动群众,配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八路军出师山西后,总部亦由陕西迁至山西。9月21日,八路军总部一到太原,北方局就向八路军的高级干部及地方党的干部明确提出:“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要建立起很多根据地,我们才能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

刘少奇还就开展游击战争问题向平津地区的党组织发出指示信。9月28日,刘少奇致电张闻天,报告了指示信的内容:“(一)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动员大批干部及同志与抗日积极分子下乡,发展、领导游击。(二)一切半公开的救国团体均取消,人员下乡游击。改组完全公开的同乡会并加入汉奸团体。(三)不能在平津立足,又不能参加游击的干部即退出平津。”

就在这一时间,北方局还就华北游击战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部署,确定了如下方针:(一)共产党在平津的组织转入长期的秘密工作,应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保存与积聚力量,以等待和准备将来反攻时期收复平津。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平津附近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干部人员除必须留在平津者外,应退到乡村组织游击队。(二)在冀东这个几年前就被日寇占领并划为特别区的地方,应准备迅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配合全国的抗战,并坚持游击战争。(三)在华北其他地区(北平的后方),应动员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战,支援前线;同时准备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在这些地区,此时主要的群众组织形式,是战地动员委员会(有一些地方是救国会)。(四)在华北即将失守的城市、矿山、铁路、工业区,号召工人、职员在敌人到来时,组织工人游击队,或到乡村同农民一起打游击。

刘少奇认为,这就是我们的行动路线。

为了实行这样一个行动路线,刘少奇还认为:“游击战争是要有根据地的,没有根据地就不能长期坚持。在华北,日军虽然占领着交通要道与主要城市,但各省边区、山地及广大的乡村,日军是不能到达或不能经常武装占领的。在这些区域中就应该

